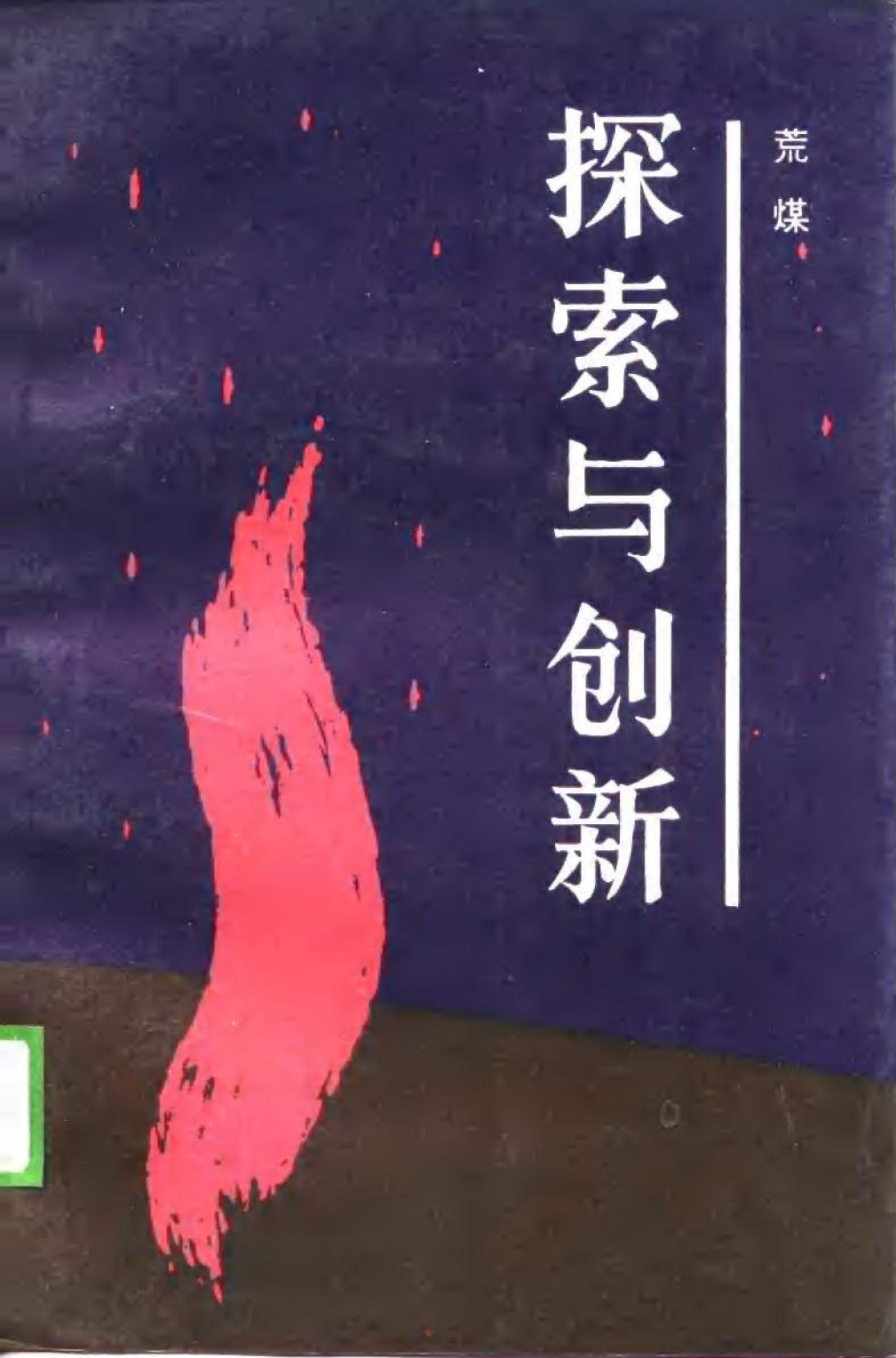


荒
煤

探索与创新



探索与创新

作者：荒 煤

责任编辑：潘 婧

装帧设计：苏彦斌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352千

印张：16 插页：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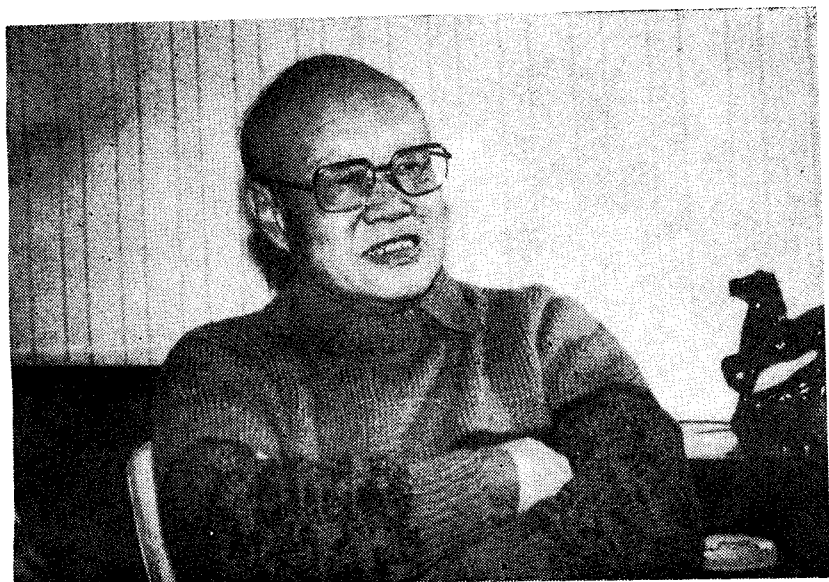
版次：1989年11月北京第1版第1次

ISBN 7-5063-0259-4/I·258

定价：6.55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作者近照

目 录

从梦幻中走向文学之路(代序).....	(1)
认识规律 掌握规律.....	(21)
接过鲁迅光辉的旗帜.....	(30)
加强当代文学研究工作.....	(33)
求真与创新.....	(56)
让事实说话.....	(61)
祝贺与期望.....	(66)
坚持并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	(70)
文艺应力求雅俗共赏.....	(84)
继续加强对抗战文艺运动的研究.....	(87)
要打开心灵的窗子.....	(93)
要采集美好心灵的花朵.....	(96)
努力探索与创新.....	(100)
尊重艺术规律 发扬艺术领导民主.....	(107)

新时期新潮小说漫议·····	(124)
关于女性文学·····	(137)
在“畅销书”面前·····	(144)
希望多一些净化灵魂的花环·····	(152)
沙汀近作《木鱼山》读后·····	(157)
谁都愿听取春天的呼唤·····	(163)
干草芳香透我心·····	(167)
诗意情真 美在人间·····	(172)
感情真挚的诗篇·····	(179)
一代人的情歌要唱下去·····	(196)
《断桥》难断人间情·····	(202)
《红尘》读后·····	(206)
滴水虽有限 深情应如海·····	(211)
真叫感人的“好戏”·····	(217)
我们需要更多的忠魂篇·····	(220)
作家要展示现代人的心灵·····	(226)
谁都应听听的悄悄话·····	(231)
把真心交给读者·····	(236)
致《穆斯林的葬礼》的作者·····	(242)
《隐形伴侣》读后·····	(246)
一首雄浑的现代交响诗·····	(253)
我希望多一点心灵美·····	(260)
感谢这种真诚的自白·····	(266)
希望在人间·····	(276)
《论艺术典型》序·····	(282)

《新时期文艺理论论争集》序·····	(288)
《顾骧文学评论集》序·····	(292)
良好的开端·····	(296)
敏感 锐气 求实精神·····	(301)
《获奖文艺家谈获奖作品丛书》序·····	(306)
踏青归来见真情·····	(311)
要发挥每一个作家的优势·····	(316)
《两岸文学会流书林》总序·····	(324)
以情动人 加强道德教育的作用·····	(327)
咱们的新天鹅之歌·····	(338)
肩负重任 奋勇前进·····	(349)
《电影理论基础》序·····	(355)
勇于探索和战斗的一生·····	(363)
新时期的电影文学·····	(380)
性格与命运·····	(411)
《新时期电影十年》序·····	(424)
漫谈典型·····	(429)
寻梦不是梦·····	(446)
难忘的亲切教诲·····	(452)
《操纵银幕的女性》序·····	(473)
《电影艺术审美》序·····	(481)
对真实的人性和美好心灵的探索与追求·····	(486)
永葆青春的艺术·····	(493)
后 记·····	(499)

从梦幻中走向文学之路

(代序)

“我这个穷孩子一无所有，
只有一颗纯洁鲜红的心灵。
我把它献给革命，
让它在革命风暴里翻腾、前进！”

这是我1927年在武汉一个小学六年级的墙报上发表的第一首不完全的其实不能叫作诗的诗歌。当时，我是学生会的宣传委员，并且编辑我们班上的墙报。

大概这是我第一次发表的作品，而且还常常在什么聚会中朗诵过，终于还记下来这开头的几句。

凡是青少年文学爱好者开始提笔写作的时候，大都是写诗，我也不能例外。

其实，这正是对文学的误解，更是对诗的误解。可也正常因为年青幼稚，对诗的了解极为简单：要有一定的韵律和节奏，要简练抒情。更重要的原因，是写起来方便。

我现在还有些模糊的印象，当时，我们这些十来岁的孩子，在墙报上发表的作品，琳琅满目的都是这些诗——其实是革命风暴中孩子颂扬革命的民歌，尽管天真幼稚，但的确充满了纯洁的革命激情和向往！

到后来，我从1931年开始写作的时候，最初也还是写诗。有一年多时间，我不断地写，不断地投稿，又因为家里穷，不能订购报纸，于是每天从家里跑到基督教青年会阅览室去查报纸。终于，在10月间，一首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东北三省罪行的诗在新民报副刊发表了。这更加激励我继续创作，也陆续发表过一些诗。

可是，这些创作都没有留存下来。

从1931年秋天写诗以来，1932年我认识了盛家伦、吕骥、张庚、郭安仁（丽尼）这些同志，参加了武汉左翼戏剧联盟、反帝大同盟一些活动，还短期编辑过《时代日报》的副刊《时代前》，我又开始弄文学、写电影戏剧评论文章。

1933年我离开武汉到上海工作的时候，这些诗与评论文章都还贴在一个本子里加以保存。

大概是1933年的秋天吧，武汉反帝大同盟组织被破坏，查到我和吕骥、张庚在上海的通讯地址，当我们听到我们三个人的通讯处和学校都有人去查询我们下落的时候，在连夜转稿的时候，我就把这本剪贴的文章撕碎扔到垃圾桶里去了。

所以，除了我在1927年墙报上发表的这四句所谓诗歌，我很幸运，再也没有留下任何现在看来肯定会脸红的创作。

这四句之所以还能记得，也是因为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亲眼看到血腥的大屠杀，感到异常的困惑、迷惘、悲伤和忧郁；然而这四句诗却经常涌上心头。正因为如此，我虔诚地

把这四句幼稚的不是诗的诗句，带着血腥的烙印永远铭刻在我的心头了。尽管我后来终于还是参加了革命文艺活动，还唱了相当一段时间的《忧郁的歌》^①，却再也没有写过什么诗。可是这四句话也真可以概括我的一生，是我在艰辛曲折的文学道路上负重前进的朴素的信念。

中国革命的道路是漫长的，有异常曲折、艰辛、复杂的历程。中国革命文学的道路也是漫长的，有异常曲折、艰辛、复杂的历程。

贫困童年的梦幻

我走向文学之路，也经历了漫长、曲折、艰辛、复杂的道路。

我的祖籍是湖北襄阳县。我于1913年12月23日诞生于上海。1925年夏天随家迁回到湖北。当时父亲在大冶铁矿工作，便来到大冶。1936年秋我独自到汉口来读书。

我的父亲陈人杰，字伯超，是在清朝末年到湖北新军第八镇第二十九标三营当兵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前，任革命总机关交通部负责联络工作。10月10日夜，武昌工程八营首先发难，我父亲就参加了起义活动。

武昌起义胜利之后，曾担任过团的粮饷科长、团参谋长、团长。参加了孙中山的中华同盟会。

后来又参加过讨袁（世凯）活动，被通缉，遂弃家出走，后来到广州，在孙中山大元帅府任参议。

从我幼年记事时起，我很少见到父亲。因为，我随同母亲和一位“伯伯”长期居住在上海。

这位“伯伯”是我母亲的姐姐，因中年丧夫，就跟随我母

亲照理我和兄弟们。

我因为不足月诞生，又被脐带绕颈几乎窒息，被认为是“不祥之兆”，生下来后就算过继给我的姨母为子。可是姨母又是一个寡妇，不知为什么，就让叫她“伯伯”。

因为父亲长期流落在外，也不能经常给家里寄钱，所以家里生活是贫困的。

我只上过两年小学和一年“弄堂小学”——只有一个教员，把十几个不同年龄的孩子放在一间屋子里教点语文和数学，可也因为交不起学费而退学。

从我记事的时候起，我就懂得“穷”是怎么回事。开始，我跟着伯伯上当铺，她把一包袱衣服送去，然后拿回一张当票、一两块银元交给眼泪汪汪的母亲。后来就我一个人去了，双手举起来才刚刚够上柜台把包袱送上去，然后拿回来一张当票和一两块银元交给眼泪汪汪的母亲。

有时候，我拿着母亲的信到她朋友家里去借钱，满头大汗地站在那些“阿姨”面前发呆，低着头不敢看人，拿到钱就像小偷似的逃窜出来。有时候，母亲请来几位朋友打“麻将牌”。我和“伯伯”就从上午忙起来，到市场去买菜，准备饭菜，从下午到深夜，几位“阿姨”打牌、吃饭、喝茶、晚间“宵夜”，我就随时去买香烟、打开水、给阿姨们倒茶……快迷迷糊糊睡着了，我才听见“伯伯”和母亲叹气，算一算这一天花费了多少钱，抽了多少“头”钱，能够对付几天的生活。我呢，每次下来就可以得到两毛小洋的“赏赐”，大概够我看一个星期的小人书的费用。

可是我心里实在厌烦这种聚会。我至今不抽烟、不喝酒，不会打麻将，就是这种聚会形成的一种厌恶的心理。

也因为我先天不足，身体弱，也很少到弄堂里和孩子们一起玩，怕“打相打”。有几个铜板，就愿意蹲到小书摊上租两本连环画仔仔细细看半天。

“伯伯”可是个书迷，整天忙碌完了，临睡前总要念一段弹词，我躺在她的身边，或偎依在她的胸前听她念，还让她给我讲解。我也记不得花了多少时间，终于听完了一部经常使我“伯伯”落泪的《玉钏缘》。

这就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的不是高层次的文学作品。

之后，又从母亲衣柜里发现了一批宝藏，就是《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等古典小说。

我的母亲则是一个《红楼梦》迷，在她枕边，随时都可以看到一本正在翻阅中的《红楼梦》。

就是在我伯伯和母亲的影响下，我开始了我的“自学”时期，拿着一本国语语音小字典和一本康熙字典，连蒙带猜地读起这批古典文学作品来。连《西厢记》、《牡丹亭》这些戏剧也似懂非懂地读了不少。

这当然说不上是什么对文学的爱好和学习，可是在一个穷孩子的脑子里却打开了一个奇妙的窗口，突然从现实贫困的生活里发现了许多朦胧的感受：贫困与不幸自古都存在，富贵荣华虽不是我能想象的，但是这些人物的命运也未必幸福。人生的悲欢离合只能为命运所决定，旦夕祸福，谁也无法预料。可尊敬的是那些替天行道、打富济贫的英雄侠客，最可恨的是那些为富不仁的奸佞、贪官、豪绅，可悲的是那些不断受害的忠臣义士……

当然最欣赏的还是一部《水浒传》。因林冲、武松、鲁智深、李逵等等这些英雄好汉聚集梁山泊，打起替天行道的旗

帜，在我看来，这就是“革命”。

就在发现这批古典文学名著的同时，我也翻出来一个“秘密”。虽然童年时代还不懂什么是革命，隐隐约约也听到父亲是一个革命党人，但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可是从书堆里却翻出了一张证书来，正中有孙中山的照片，两边就写着这两句话：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现在我也记不清这是一张什么证书，但是送给母亲时，看到她那惊慌失措的神情，也就懂得这是可怕的秘密了，在我心中也就证实了父亲是个革命党人了。

其次，读得较多的就是《红楼梦》。正如我在一篇文学生活回忆散记^②中所讲的：

“至于喜爱《红楼梦》，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如果说荒野干旱的草原里最需要的是春天的雨露和阳光，那么一个十来岁的穷孩子，在忧郁稚嫩的心田上，就更加需要情感的滋润，甚至播下爱情的种子，尽管是异常天真却又朦胧的爱情的萌芽！”

我这时候，当然根本没有想到这些小说戏曲，就是所谓文学，甚至可以成为一个人终生的爱好和终生奋斗的事业。

可是，文学却成了我自学的主课，也开启了、丰富了我的心灵，至少也朦胧地感觉到人生和生活的复杂性，以及产生一种对革命的憧憬，期望革命早日成功。也养成了读书的嗜好。

家里的宝藏都翻光了，我就开始去逛旧书店。

我家住在上海旧法租界霞飞路附近一条小街上，到当时四马路（现在的福州路）书店去大约有五里路左右。当时四马路是上海市书店最集中最多的一条街，也是旧书店最多的一条

街。我常常是用大半天的时间——或者上午去，中午吃一碗“阳春面”（清汤面），或者买两个烧饼吃了，逛到晚上才回来；或者下午去，晚饭买个油条烧饼吃了再继续逛。

渐渐地，虽然没有一目十行的能力，也可以高速度跳跃地把一本书的故事梗概弄清楚。一部大部头著作，一时看不完，站在书柜前翻久了，被店员下了驱客令，就又转到另一家书店去看；今天看不完，明天再来看。总之，成了一个书迷，每天都有几个小时在书海里飘荡，晕头转脑，越读越多，越读越杂，有许多许多的东西超过自己年龄所能想象和理解的，有时候，便对人、对生活、对现实都感到有许多说不出的迷惘甚至恐怖。

可是后来主要的兴趣，还是落到公案武侠和才子佳人这些小说上。因为，一方面，从所看到的人世间许多不平不幸的事情，以及我们家始终摆脱不了贫困生活，“革命”似乎还不能很快来到，只得从书中的忠臣清官和英雄侠客仗义而为，为民除害的故事中得到一点精神上的安慰。另一方面，无非是期望得到一点朦胧的感情上的满足。所以说，文学只不过是在我贫困的童年生活中增添了一些梦幻而已。

革命文学的召唤

1927年我在武汉上高小的时候，革命果然到来了。我一下子被卷入了大革命的风暴中。

在我这个十四岁的常年淹没在贫困的生活中的儿童看来，这就是革命的胜利。

那时候，整天歌声不断，红旗飘扬，各种各样的游行集会，我编墙报，写诗，组织各种节日的娱乐活动；游行时我是

乐队的小鼓手，开群众大会时候，我是童子军，带着红领巾，手执木棒站在舞台或会场前列维持秩序，充满了兴奋、欢乐、骄傲和庄严的感觉。

尤其是听到父亲这个老革命发出真心的感叹：“看来，今后是共产党的天下了。”并且同意我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我也的确加入了共青团，真正成为一个自豪的小革命家了。

正如我在文学生活回忆散记中所写的：

“总之，那时候，的确感到整个身心都淹没在革命的风暴里。觉得革命成功了、胜利了，我将永远抛掉贫困、忧郁、自卑……我为自己参加这一场革命而感到骄傲，现在回想起来，那种狂热骄傲的心情，当然是幼稚的，然而却是纯真的。从当时的认识来看，对这场革命的意义和内容，是很不理解的；然而，也许就是这种朦胧的意识，使我认为革命已成功，觉得似乎已经涤荡了旧世界与旧社会的一切黑暗、痛苦、悲哀与丑恶的东西——帝国主义列强和一切军阀的压迫，光明已经笼罩着世界。我这颗孩子的心为崇拜革命的威力而更加感到骄傲。在我的一生中，只有这一次，也只能有这样一次天真狂热的骄傲！因为，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在中国革命的征途中，饱经坎坷，看到伟大的胜利、光辉灿烂的成就，也看到悲惨的失败和严重的教训，才真正懂得了革命的艰苦，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不可能再产生那种天真无知的骄傲。

另一方面，我也庆幸有过这样一段短暂的纯真的骄傲，它使我在十年动乱中，有一阵觉得生命垂危甚至到了绝望的时候，脑海里突然闪现出一道令我心颤的照亮了我的灵魂的光芒，使我终于增加了信心，活了下来，并且站了起来。”

可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了，轰轰烈烈革命风暴突然被血

腥的屠杀所淹没。我从一个狂热的革命高潮中突然坠入迷惘忧伤的深渊。

我自然无法理解，也不可能理解这个突变。

我长期陷于一种忧郁的苦闷之中。

这时候，我父亲在一个县的税务局谋求到一个职位，也可能是看到革命风云的梦幻难以捉摸，为了我的所谓前途着想，让我学英文，并通过一些关系，让我去投考商业专科学校。大约在1928年秋，我进了湖北省二中高中商业专科学校。

我没有进过初中，除了语文、历史课程外，数学、英语的底子都很差，加上什么银行簿记、成本会计等等这些我毫无兴趣的课程，简直是在我脑子里套上了重重的枷锁，越发使我感到苦闷不堪。

然而，恰巧在这种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又使我发现了一个新大陆。

我父亲的一位朋友的儿子叫向伯欧，是在邮局工作。有一天到他家里去玩，发现了他那个小小的神奇的图书馆。

正是在大革命失败之后，上海掀起了一个革命文艺运动的热潮。可是这些书籍与杂志到了武汉——这个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地区，一律被邮局扣押下来了。向伯欧爱好文艺，便悄悄地偷了一些带回家里看，看完了送回去，又再拿回一些来。我也就开始从他那里借些书刊回家看。那时候，如太阳社的《太阳月刊》、《时代文艺》、《新流月报》、《拓荒者》，创造社出版的《创造周报》、《创造月刊》、《奔流》、《南国月刊》……以及创造社的许多小说诗歌我都能看到。

我至今还记得，我最感兴趣的一本创作小说，就是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最感兴趣的一本翻译小说就是高尔基的

《母亲》。

这时候，如我在文学生活回忆散记中所讲的：

“我就如饥如渴，狼吞虎咽地读了不少这类禁书。我终于朦朦胧胧地感觉到一股革命的潜流，正在通过文学这个渠道喷发出火焰来，使我感到幻灭的心灵又渐渐苏醒过来。我那似乎没有着落的灵魂渐渐被革命文学召唤回来了，我好象有了一个新的生命。”

我这时产生了一个新的梦幻，幻想我也能提起笔来呼唤革命。

但是，这个新的生命在成长过程中充满了复杂的矛盾。

一方面我进入青少年时代，在三年高中学生生活的时期，正好是十五岁到十七岁的年龄。这三年正是我父亲获得一个比较稳定的职业，使家庭摆脱了穷困的时期。除了爱好新文学之外，我也热爱京剧与电影——当然主要是美国电影。并开始阅读各种翻译小说，有一阵就热衷于美国辛克莱的作品，如郭沫若化名易坎人翻译的《屠场》、《石油王》、《钱魔》等，也热爱法国莫伯桑、俄国契诃夫、高尔基的短篇小说……

我厌烦我学的那些毫无兴趣的课程，又一直为每学期的考试发愁。

我似乎重新被点燃了对革命的希望之火，但大革命失败的伤痕还太深，我还不能摆脱那沉重的忧郁的记忆。

由于生理的成熟和文学作品的熏染，我开始被各种作品中所描绘的各种各样的美好的爱情和爱情的悲剧激起了渴望爱情的萌芽，可是我又患上了轻微的肺结核，不相信我会获得美满

的爱情……而1931夏天突然爆发的一场淹没武汉三镇的大水灾，又给家庭带来莫大的灾难。父亲的失业，我的失学失业，外祖父母和一个兄弟的病逝……

而我已经清晰地想到我是一个十八岁的成人了，面对家庭的境遇，即使我还不能为父亲承担起养活一家人的重担，我至少也应该首先养活我自己。可是，事实证明，连这一点我也做不到。我重新陷于忧郁与苦闷之中。

为了排除这种忧郁与苦闷，我便提起笔来抒发我的忧伤，写起诗来。

1932年我经过同学薄芝章的介绍认识了董启翔、盛家伦、吕骥、张庚、丽尼这些朋友，之后又跟随他们参加了武汉剧联、反帝大同盟活动，又重新投入革命的洪流中来。我不仅写诗，也写评论——戏剧、电影、小说的评论。在1933年春在《时代日报》编辑“时代前”副刊的时候，作为补白，还写点杂文。可是，我最大的愿望还是想写小说。

我1933年秋天离开武汉到上海参加剧联工作，虽然也参加许多戏剧活动，但同时也开始试着写小说。

终于，经过反复修改，我完成了第一个短篇小说，以反映1939年武汉大水灾为背景的《灾难中的人群》。我把它交给了丽尼。

1931年夏天，我参加了上海剧联组织的一个剧团《大地剧社》到南京去演出。这个剧团的领导人是章泯、宋之的等人。这个剧团从南京返回上海，在北火车站全体被捕，后经上海剧联多方营救，除宋之的因以前被捕过被继续关押外，都被保释。

我因为在上海生活一时没有着落，又接到父亲的急电要我回家去，我就又回到武汉去了。